

应县木塔所发现的北京早期印刷品

郑 思 淮

一九七四年，在山西应县本塔发现了世所罕见的辽代珍品，绝大部分为辽代印刷品。计有《辽藏》十二卷，辽零刻经三十五件，刻书一件，杂刻七件，版刻佛画六件。这批印刷品，雕版工整，字体隽秀，纸墨精良，印刷优美；更为可贵的是纸质坚韧、光洁，秘藏木塔近千年，无一虫蛀痕迹，可见入潢避蠹之功效。《辽藏》和零刻经中均有题记，标明其雕印年代、地点、书手、雕工、校者、督造等，弥足珍贵，为刻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辽藏》十二卷，皆用藏经纸，有千字文编号，千字文编号与《开元释教录》不同，此系根据《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编排，证明确是《辽藏》。其中《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卷尾的题记，提供了雕造年代、地点等，十分珍贵。其文云：“燕台圣寿寺慈氏殿主讲《法华经》传菩萨戒忏悔沙门道撰，曾阅前经，备询故事曰：大乘者，诸佛至真了义究竟之说也。不思議解脱宁可述矣。先圣既至极称赞，末叶宜激励流通，庶几报诸佛恩，除小乘病，最极最大，至微至妙，利国利家，济时济物，无如此经也。道撰遭逢圣代，幸偶遗风，敢雕无上之经，溥示有缘之众，所愿见闻随喜者，舍小根而趣大机，读诵归依者，得清凉而除热恼。时统和貳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冀生五叶记。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共雕。”

沙门道撰此愿文，是为宣传佛法，又为后人保存了宝贵的史料。燕台圣寿寺，即辽南京，亦即燕京圣寿寺（在今北京。）

应县木塔共出之《辽藏》，除《称赞大乘功德经》外，《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 垂、《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四 爱、《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六 爱、《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五十一 首、《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在、《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 靡、《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 欲、《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清、《阿毗达摩发智论》卷第十三 弟。皆雕印于辽圣宗中晚期（997——1012年），燕京悯忠寺无碍大师诠明等主持其事。《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刻，雕印于辽圣宗太平时期（1022——1030年），由燕京沙门可元等主持。《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 勿，雕印于辽兴宗重熙时期（1032—1054年），由燕京圆福寺沙门觉苑等主持。①

应县木塔发现《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卷首佛画右上角有牌记二行：“燕京雕历曰，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同雕记。”此雕工赵守俊与共出之《称赞大乘功德经》雕工赵守俊应为一入。只是此处雕工赵守俊为家庭作坊主，同长男、次弟同雕；而《称赞大乘功德经》是同穆咸宁、李存让、樊遵共雕。故知此经雕印时间，将晚于《称赞大乘功德经》，但不会晚于圣宗末期。

《佛说八师经》一卷，卷尾题记曰：“李韩氏奉为亡夫应梦雕施，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造。”据《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转引之《元一统志》曰：大昊天寺建于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秦越大长公主舍紫阴坊第为寺，道宗施五万缗以助，在辽燕京城内建成此大昊天寺。此经似应雕印于辽道宗时期。

辽零刻经《上生经疏科文》，卷首题刻为“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改定”，“诠明”二字上有朱文押记。卷尾题记曰：“时统和八年岁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戊午故记，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所有讲赞功德回施法界有情。”

“燕台悯忠寺，即今北京宣武区法源寺，为燕京名刹。燕京仰山寺，《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有记载，在辽金故城归厚坊，佛殿题梁为辽穆宗应历十一年（961年）八月十五日。”

《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与《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是共出之辽刻经中最优秀的两卷经，纸质、雕版、印刷均属上乘，两经版式、纸质、字体、卷尾题记都完全相同，为同时同地所刻。题记云：“咸雍七年十月 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殿主讲经觉慧大德臣沙门行安勾当。都勾当讲经诠法大德臣沙门方矩校勘。右街天王寺讲经论文英大德赐紫臣沙门志延校勘。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

燕京弘法寺为著名古刹，金代大藏经《金藏》或称《赵城藏》，经版自山西解州（山西运城西南解州）运抵中都（北京市），即贮藏于此寺，又於该寺补刻四分之一左右。元代官版大藏经即以此寺贮藏之经版为底本，又加以重编、增补、雕印而成，因之名为弘法藏。据转引的《元一统志》等书记载了这段历史。但是，各书均未记载辽时弘法寺的情况，两经题记证明弘法寺在辽代已规模宏伟、雄壮冠于全燕。燕京寺观众多，惟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且由印经院判官提点，雕印佛经质量如此优越，足见弘法寺地位之显赫。天王寺即今天宁寺，《元一统志》以后历代史书均有记载，且造型古朴、塔身雕像生动，系密檐式古塔，至今仍屹立于北京广安门外。两经於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年）雕印在辽燕京，恐确凿无疑。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卷尾题记曰：“摄大定府文学庞可升书。同雕造孙寿益，权司戾、赵从业、弟从善雕。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经版主前家令判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督御史武骑尉冯绍文，柚（抽）己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一部，印造流通。伏愿承此功德，回施

法界有情，同霑利乐。时太平五年岁次己丑八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记。”

据《元一统志》卷一在“坊郭乡镇”中，曰辽金故都西南西北四十二坊中有显忠坊。又《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转引《析津志》云：“竹林寺始于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年）。宋楚国大长公主以左街显忠坊第为佛寺，赐名竹林。”这里所载之燕京显忠坊，即此经题记中之显忠坊。此经雕印于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八月十五日。

《新雕诸杂赞》第一行题目为：“燕台大悯忠寺常住院内新雕诸杂赞随名各列如后。”

此处虽未标明年代，但从《元一统志》悯忠寺条下记载了“咸雍六年（1070年）表寺额，始加大字”，知为咸雍六年以后雕印。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卷尾经名下有朱书“在”字。似为补《辽藏》之所缺。故知为辽圣宗时期雕印于燕京。

以上诸经，从直书或旁证中，知均为辽圣宗和辽道宗时期雕印于辽燕京，共出之其他印刷品，虽无题记可考，但从用纸、版式等特点来看，与上述有题记可考诸经为同时同地雕印。

北京自古以来即为我国北方重镇，是我国古代六大名都之一，经济文化发达。辽朝统治者对于燕京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极为重视，皇帝亲至燕京下诏减免税收，处理淹滞刑狱，禁止私度僧尼等，并与民同庆丰收。“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保持了近百年的和平共处局面，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

正因为燕京经济文化发达，人才荟萃，具备了雕印佛经的条件，所以，应县木塔发现之辽代印刷品多为燕京雕造。燕京有以白纸坊地区为中心的造纸作坊；有读书之人校对、书写；有技术熟练的雕工；有众多的寺观。如悯忠寺、弘法寺、天王寺等；有《续一切经音义》的高僧希麟、有为《龙龕手鑑》作序的高僧智

光和悯忠寺的无碍大师说明。这些条件决定了燕京成为辽朝雕版印刷业的中心。

印刷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传播做出过巨大贡献。早在一千三百年前，我国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木板雕印的《金刚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印本书。1944年在四川成都望江楼唐代墓出土的《陀罗尼经》印本，是考古发掘的早期印本。但是，流传至今的印刷品却如凤毛麟角，且不说唐代印本，北宋印本亦属罕见，而兴起于唐末，与北宋对峙之辽朝，其印本未见传世，即片纸只字，亦极珍贵，今应县木塔发现如此大量的辽代印刷品，实为梦寐以求之辽代瑰宝，填补了我国印刷史上的一段空白。更为可贵的是皆雕印于辽燕京（即今北京），成为北京历史上早期的印刷品之一。据考北京前此所见早期的印刷品是元宪宗六年（1256年）印制的《歌诗编》，而应县木塔发现《上生经疏科文》，由燕台悯忠寺说明大师改定，统和八年（990年）八月十五日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此经的印制早于《歌诗编》二百六十六年。共出之《称赞大乘功德经》由燕京圣寿寺沙门道撰于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三月初五日作记，穆咸宁等人雕造。早于《歌诗编》二百五十三年。《妙法莲华经》卷第四，由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太平五年（1025年）八月十五日作记。亦早于《歌诗编》二百三十一年。《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均为咸雍七年（1071年）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雕印时间亦早于《歌诗编》一百八十五年。由此，可以说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印刷品是北京历史上早期的印刷品之一。

注：

①见《论契丹大藏的雕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